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余子侠
郑刚
编

余家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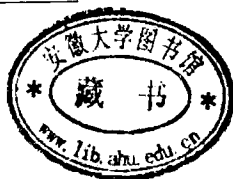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余子侠
郑刚
编

余家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余家菊卷/余子侠, 郑刚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300-17137-1

I. ①中… II. ①余…②郑…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余家菊 (1898~1976)-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953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余家菊卷

余子侠 郑刚 编

Yu Jiaj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9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詐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

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他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有人觉察。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方东树、唐鉴卷

包世臣卷

林则徐卷

姚莹卷

魏源卷

徐继畲卷

冯桂芬卷

曾国藩卷

左宗棠卷

洪秀全、洪仁玕卷

郭嵩焘卷

王韬卷

张之洞卷

杨仁山卷

薛福成卷

经元善卷

沈家本卷

马相伯卷

王先谦、叶德辉卷

郑观应卷

黄遵宪卷

皮锡瑞卷

廖平卷

严复卷

夏震武卷

汤寿潜卷

辜鸿铭卷

康有为卷

黄爱平 编

刘平、郑大华 主编

杨国桢 编

施立业 编

夏剑钦 编

潘振平 编

熊月之 编

董丛林 编

杨东梁 编

夏春涛 编

熊月之 编

沈巍 编

吴剑杰 编

何建明 编

马忠文、任青 编

朱泚 编

李欣荣 编

李天纲 编

王维江 编

任智勇 编

陈铮 编

吴仰湘 编

蒙默、蒙怀敬 编

黄克武 编

王波 编

汪林茂 编

黄兴涛 编

张荣华 编

宋育仁卷	王东杰 编
汪康年卷	汪林茂 编
宋恕卷	邱涛 编
夏曾佑卷	杨琥 编
谭嗣同卷	汤仁泽 编
吴稚晖卷	金以林 编
孙中山卷	张磊、张莘 编
蔡元培卷	欧阳哲生 编
章太炎卷	姜义华 编
吴雷川卷	何建明 编
唐群英、金天翻、秋瑾、吕碧城卷	夏晓虹 编
欧阳渐卷	何建明 编
杨毓麟、陈天华、邹容卷	严昌洪、何广 编
梁启超卷	汤志钧 编
杜亚泉卷	周月峰 编
吴虞卷	罗志田 编
张尔田、柳诒徵卷	孙文阁、张笑川 编
王国维卷	彭林 编
邓实卷	王波 编
黄炎培卷	余子侠 编
胡汉民卷	陈红民 编
陈独秀卷	萧延中 编
陈撷宁卷	郭武 编
鲁迅卷	孙郁 编
章士钊卷	郭双林 编
宋教仁卷	郭汉民 编
蒋百里、杨杰卷	皮明勇 编
江亢虎卷	汪佩伟 编
马一浮卷	吴光 编
刘师复卷	唐仕春 编
刘师培卷	李帆 编
朱执信卷	谷小水 编
周作人卷	孙郁 编

高一涵卷	郭双林	编
熊十力卷	郭齐勇	编
任鸿隽卷	樊洪业、潘涛	编
蒋梦麟卷	马勇	编
张东荪卷	左玉河	编
丁文江卷	宋广波	编
钱玄同卷	张荣华	编
张君勱卷	翁贺凯	编
赵紫宸卷	赵晓阳	编
李大钊卷	杨琥	编
太虚卷	何建明	编
李达卷	宋俭、宋镜明	编
张慰慈卷	黄兴涛	编
晏阳初卷	宋恩荣	编
陶行知卷	余子侠	编
戴季陶卷	桑兵	编
胡适卷	耿云志	编
曾琦、李璜卷	田嵩燕	编
郭沫若卷	谢保成	编
卢作孚卷	王果	编
汤用彤卷	汤一介	编
吴耀宗卷	赵晓阳	编
顾颉刚卷	顾潮	编
张申府卷	雷颐	编
梁漱溟卷	王宗昱	编
恽代英卷	刘辉	编
金岳霖卷	王中江	编
钱穆卷	彭林	编
刘咸炘卷	罗志田	编
傅斯年卷	欧阳哲生	编
罗家伦卷	张晓京	编
常乃惠卷	查晓英	编
余家菊卷	余子侠、郑刚	编

瞿秋白卷
潘光旦卷
朱谦之卷
陶希圣卷
钱端升卷
王亚南卷
黄文山卷
雷海宗、林同济卷
贺麟卷
陈序经卷
徐复观卷
巨赞卷
唐君毅卷
牟宗三卷
费孝通卷
殷海光卷

陈铁健 编
吕文浩 编
黄夏年 编
陈峰 编
孙宏云 编
夏明方 编
赵立彬 编
江沛 编
高全喜 编
田彤 编
干春松 编
黄夏年 编
单波 编
王兴国 编
吕文浩 编
何卓恩 编

目 录

导 言	1
教科书革命 (1920)	22
我对于师范学校的希望 (1920)	26
乡村教育的危机 (1920)	31
儿童的道德性 (1920)	35
教师和学生间的交际问题 (1920)	42
性欲的教育 (1920)	50
自动教育新论 (1920)	59
游戏教育 (1921)	68
论中学附设师范科 (1921)	77
儿童心灵的发育 (1921)	83
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 (1921)	96
提倡见习式的留学 (1921)	109
国语科的几个问题 (1921)	115
严格训练与管理 (1921)	123
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 (1922)	125
评教育联合会之学制改造案 (1922)	130
中华职业学校之一瞥 (1922)	135

达尔登制之实际 (1922)	140
民族性的教育与退款兴学问题 (1922)	155
教育零感 (节选) (1922)	171
“道尔顿制”与中国之教育 (1922)	177
人格之动力 (节选) (1922—1923)	182
中国教育的统一与独立 (1923)	198
教育杂言 (1923)	203
中华民族的教育要养成忠恕集义的理念 (1923)	207
个性与学程编制 (节选) (1923)	210
感情教育论 (1923)	222
教会教育问题 (1923)	251
读常道直君《学校风潮之研究》(1923)	268
国庆日之教育 (1923)	274
理想与训育 (节选) (1923)	281
道尔顿制之精神 (1924)	294
教育建国论发微 (1925)	301
收回教育权问题答辩 (1925)	307
课程论 (1925)	315
教育界与法治主义 (1925)	331
论教会学校之收回与注册——并质朱经农君 (1925)	333
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与其他三种主义之比较 (1925)	338
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 (1925)	348
国家主义的教育之意义 (1925)	362
道尔顿制与中国之教育 (1925)	367
中英教育之异点 (1926)	369
师范教育行政 (1926)	377
爱国教材在小学教育上的地位 (1926)	391
师范教育之特质 (1926)	403
公民教育之基本义 (1926)	409
近代乡村教育之缘起 (1931)	414
乡村教育之目的 (1931)	422
训育之性质 (1931)	427
教育是什么 (1933)	433

受教者 (1933)	438
教育目的论 (1933)	446
会考问题之商榷 (1934)	454
中国教育之检讨 (1936)	462
学习社会科学之基本认识 (1937)	467
大学制度之改革要点 (1938)	473
大学制度商酌 (1942)	476
论大学学系制度 (1942)	484
论大学导师制 (1942)	489
论教育上之物力与人力 (1944)	493
教育之生命 (1944)	496
论今日习气之由来及其救治法 (1944)	501
民主与教育 (1951)	506
余家菊年谱简编	512

导 言

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又字子渊，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出生于一书香之家，七岁就受家塾教育，诵习旧学经典，十二岁时考取黄陂发启高等小学堂，但留家族“自治”学馆兼习新旧之学，十三岁时考入县立道明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2年（十五岁）入设于武昌的教会学校文华大学预科，是年秋即转入私立中华大学游美预科，攻习法政学说，翌年游美预科并于大学预科，遂为预科一年级学生。1915年6月预科毕业，旋于次年春入该校本科中国哲学门，同学有恽代英等13人。大学期间，系统学习国学，尤喜王阳明学说，且阅读英文能力大增。其间曾在汉口民新学校授英文夜课，先后加入过学生团体仁社、互助社等，后者为恽代英所创，并与恽代英共同发起进德会。1918年7月本科毕业后，与恽代英等同为校长留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监（恽为主任），是年夏助族兄创立自进高等小学于宗祠内。留校任职期间，领导学生办有刊物《共进》，与朋辈创办刊物《教育改进》。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旋受北京来鄂的王光祈的动员并介绍加入，与恽代英等为会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渐生离开中华大学附中之意，适逢北京高等师范创设教育研究科，乃于1920年春入京就学于该研究科第一班，认真攻